

# 莫須有先生與他們的蛙跳

● 趙毅衡

劉康先生發表在《二十一世紀》1996年10月號的文章〈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的不同選擇〉，把他的觀點以及「後學」諸說放在更廣闊的背景中討論，對深入討論中國文化現狀以及知識份子的責任很有助益。只是，劉康文中有一句，使我驚奇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sup>①</sup>：

趙毅衡反對「新保守主義」，因為它「與中國官方合謀」。這種看法，作為一種政治立場是一回事，而作為一種「事實」陳述，則大可商榷。

「與中國官方合謀」——打了引號，而且說是我的「陳述」。《二十一世紀》對該文的嵌邊提要，也很敏感地抽出了「與官方合謀」，也打上了引號。從這個「事實」出發，劉康繼續寫了一大段的「我想問趙先生」。而我想問劉先生的，卻只有一句：趙某人在哪篇文章、在甚麼場合中用過「與官方合謀」這五個字？

我之所以如此驚奇，是因為這已經是第若干次有人引用據稱是我說的

這五個字。一次是在西歐某地某學術會議上，遇見一位從國內遠道而來的理論界朋友，他竟然好多天裝作不認識我似的。我在文字中引用過此友的觀點而且表示不贊同，但深知此友並非如此小器量之人。一直到會議進入理論討論，他當面說出了據稱是我說的這五個字。問題一說清，一切前嫌當然冰釋了。

第二次更慘：今年夏天在北京，某朋友告訴我，理論界不少人對我反感，因為我亂給人戴這五字帽子。這位朋友當然不願告訴我這些「不少人」是誰，我也只能請這位朋友「有機會時代為澄清」。

這幾次誤會還能讓我說上一句，但相信有更多的誤會是我無法一一辯白的。因此我很感謝劉康這樣的朋友，能把問題落到紙面，使我有機會以書面說明。

其實我也知道，這篇短文無法對抗流言的造、傳、信。這五個字，不必有出處，照樣不脛而走，引起理論界的公憤，也可套上引號，作為立論根據。叫人很不明白：寫文章的根據

據我所知，還有許多遠遠比「與官方合謀」這五字帽更聳人聽聞的怪談落到我身上，使人懷疑流言出發之處是有明確的意圖，即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

是靠讀書，還是靠道聽途說？如此引出的論辯，自然落空；一聽而義憤的理論家，如何思考？

流言落到我耳朵，已是周遊了一年多，我聽到的，也不會是全部。據我所知，還有許多遠遠比這五字帽更聳人聽聞的怪談落到我身上，使人懷疑流言出發之處是有明確的意圖。其實造出此類話頭的人，正是欺侮暫居海外者「口頭消息」不靈通，欺侮《二十一世紀》在國內尚難讓每個人讀到。

我主張「以文對文」，聽起來好像太起碼，但這一點兒「文德」，似乎並不是每個人都具備。此篇小文只是想提醒同行們，聽到傳聞後不妨追問一下出處，不妨讀書以求證。如果書難以讀全，最好的辦法是，尚未親自讀到的，不必聽信，尤其是對那些自稱在引用《二十一世紀》的人。

劉康在另一處似乎找到了根據②：

趙文指出「劉康認為官方話語有美學或理論價值」，……這樣，「新保守主義」的意思就清楚了：新保守者，「與官方合謀」也。

但我看不出這種跳躍式的推論怎麼會「意思清楚」？我的原文討論得很明白：指的是劉康所讚揚的毛澤東式政治與文學關係理論，也就是我們一般說的「官修文學史」，沒有任何與官方文化機構「合謀」的意思③。現行的官方文化政策，與劉康所辯護的毛澤東文學理論，兩者已有很大差別。「官方」也並非只有一個聲音，其文化政策雖然好像大致有個路子，實際上可以說走一步看一步，甚至政出多門。與官方「合謀」？難乎哉。

話又說回來，我究竟有沒有說過後學家們所謂的「與官方合謀」這句話，其實有甚麼了不起？有甚麼必要辯明？我本人招來不少誤會，失去一些朋友，《二十一世紀》的討論情緒化了一些，在莫須有的偽問題上轉了些圈子，這都不過是小小的文壇上的邊邊角角之事，沒有必要捶胸頓足、呼天喊冤。

的確，此類流言及其後果不過是小事一樁。甚至，新保守主義是不是，或是否僅僅是，與經常在變化的「官方」文化政策相呼應，也不是我們討論的中心問題。劉康說我的「基本依據即為官方／反官方的二元對立」，這指責卻比較重要，因為它關係到如何理解文化批判在當今中國的任務。

中國文化界的新保守主義之所以值得密切注視，是由於它自覺不自覺地為當今中國的文化現狀（而不一定是即時即地的官方文化政策）辯護，所以我稱這些理論為「順應理論」時，並不是張頤武所認為的「將論敵變為政治上的敵人」④。而我及一些朋友堅持的文化批判，其對象遠不只是「官方」，而是文化現狀的體制化。這「體制化」可以是複數。把文化批判的對象僅僅判定為「官方」，不僅混淆了政治範疇與文化範疇，而且更歪曲了文化批判的責任，把文化批判簡化成「文人議政」。

劉康是否能夠另寫一篇瞄得更準一些的文章？

這場關於中國文化現狀的辯論之所以變得如此緊迫，恰恰是由於目前中國文化體制的運作動力並不一定來自官方，它也來自文化體制的各色參與者，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唾棄文化批判的「知識份子」（加上引號並不是因

中國文化界的新保守主義之所以值得密切注視，是由於它自覺不自覺地為當今中國的文化現狀辯護，而我及一些朋友堅持的文化批判，其對象遠不只是「官方」，而是文化現狀的體制化。

為他們「知識」不夠，而是我認為現代知識份子最重要的社會責任在於批判地審視文化現狀。我們開始這場辯論時，很多人還看不到這種趨勢，一年多後的今天，卻已經變得相當明顯，也已相當危險。今年夏天出現的媚俗式民族主義即是一證：發動者可能並無官方背景，官方也無法讓老百姓掏腰包。

劉康自己也看到：「在中國文化界、知識界的確形成了某種主流思潮，填補着中共文化霸權日趨失落後的意識形態空白。」<sup>⑥</sup>既然如此，又有甚麼必要在「與官方合謀」這個題目上大做文章（劉文中提了六次「官方」！），況且這題目純屬子虛烏有。我們在討論的，正是這個「主流思潮」是甚麼。

劉康和其他一些人認為，這個新形成的「主流思潮」是「全球化文化想像所傳播的資本主義現代化一元決定論」<sup>⑥</sup>；而我則認為它是以「不同選擇」為旗號，以西方諸「後」學為理論支持，以肯定「當今文化現狀」為主旨，以文化上的民族主義為背景的新保守主義文化思潮。因此，說到底，我們討論的關鍵並不是劉康所說的「官方／反官方」對立，也不是「一元論／文化多元」之爭，而是有關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方案」還要不要。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即具有文化批判意識的現代知識份子群體是否已經形成，究竟還有無必要。再進一步說，有沒有必要建立中國的文化批判學派。

海內外一部分朋友，包括我，認為應當堅持文化批判，不然後果將極為嚴重。而另一部分人認為，現代性及文化批判在理論上已經過時，在中國90年代的文化現狀中文化批判已無必要，完全可以多元同價，各得其所；在批評實踐中，它則是自討苦吃

的堂吉訶德（本次討論已可證明），而且毫無前途。中國知識份子的前途只能是「回歸傳統」或「民間家園」，或是「參與當下文化」，因為未來將是「同流合污」。

至於持這後一種意見的某些人，既被稱為「新保守」又被稱為「新左派」。這兩個稱謂其實並不矛盾：在中國近四十年「保守的左派」是太常見了。雖然我個人覺得這些名稱歧解過多，最好不糾纏。

劉康說：「現代化作為一個歷史階段，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只是一個特殊現象。」<sup>⑦</sup>這話絕對正確。但我們一直在討論的，就是中國（還有許多許多發展中國家，遠不是劉康所說的「中國特殊論」）能不能「蛙跳」（leapfrog），略過這個叫許多人頭痛、在西方已被某些理論家宣布為過時，在東方卻被證明為完全「不必選擇」的歷史階段。如此看來，整個地球「蛙跳」躍入後現代，倒恐怕真是一個帶着「西方資本主義」色彩的、皆大歡喜的「全球化文化想像」。

說到底，我們討論的關鍵並不是劉康所說的「官方／反官方」對立，也不是「一元論／文化多元」之爭，而是有關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方案」，即具有文化批判意識的現代知識份子群體是否已經形成，究竟還有無必要。再進一步說，有沒有必要建立中國的文化批判學派。

#### 註釋

①②⑥⑦ 劉康：〈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的不同選擇〉，《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5年2月號，頁141；141；145；195；141。

③ 趙毅衡：〈「後學」與中國新保守主義〉，《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5年2月號，頁11。

④ 張頤武：〈再說「闡釋中國」的焦慮〉，《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4月號，頁125。

趙毅衡 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執教於倫敦大學東方學院。